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系列丛书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云南铜志》校注

〔清〕

戴瑞徵 著

杨黔云 总主编

梁晓强 校注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云南铜志校注

总主编 杨黔云

【清】戴瑞徵

校注 梁晓强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南铜志》校注 / (清)戴瑞徵著; 杨黔云总主编; 梁晓强校注.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7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ISBN 978-7-5643-5632-3

I. ①云… II. ①戴… ②杨… ③梁… III. ①铜—有色金属冶金—工业史—研究—云南—清代 IV. ①F42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9845 号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YUNNAN TONGZHI》JIAOZHU

《云南铜志》校注

[清]戴瑞徵 著
杨黔云 总主编
梁晓强 校注

出 版 人 阳 晓
策 划 编 辑 黄庆斌
责 任 编 辑 吴 迪
助 理 编 辑 李施余
封 面 设 计 严春艳

出 版 发 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 行 部 电 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33
字 数 507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5632-3
定 价 9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总 序

铜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位于今甘肃境内的人类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人类使用的铜制物品，这是最早发现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使用的铜制物品。当然，当时的铜以天然的红铜为主。之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我们的祖先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随即铜和铜制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伴随人们走过了历史长河，我国也因此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地处边疆地区的云南，素以产铜闻名于世。《云南铜志》载：“滇之产铜，由来久矣。……我朝三迤郡县，所在多有宝藏之兴轶于往代，而铜亦遂为滇之要政。”储量丰富的铜矿，为云南铜文化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滇铜又以滇东北的铜而闻名，从考古发掘和文献典籍记载来看，滇东北地区产铜较早。新石器时代，滇东北地区就已有较成熟的青铜器^[1]。金正耀、岑晓琴用铅同位素对商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商周青铜器的铜料进行分析，认为妇好墓青铜器及其他商周青铜器的铜料有的来自今滇东北的昭通、东川、会泽、巧家等地^[2]。到了汉代，滇东北地区的铜已负盛名。西汉在滇东北设置朱提郡领堂琅县，其辖地为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任乃强先生认为“堂琅”是夷语“铜”的意思。《华阳国志》也记载，堂琅产“银、铅、白铜^[3]、铜”。堂琅不仅产铜，还出产铜器，从全国各地考古出土的汉代铜锡铭文记载来看，以朱提、堂琅制造的铜洗为多，说明汉代滇东北的铜器制造已经为其他地区服务了。可见，滇东北的昭通、会泽、东川等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是铜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也为该地区以铜为中心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云南铜矿开发最盛的时期应为明清两朝，其中尤以清朝前期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明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

会发展对铜的需求不断增加。1382年,明王朝击败蒙古残余在云南的势力,统一云南后,云南铜矿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清朝建立后,康、雍、乾时期对云南铜矿的开采,特别是对滇东北地区铜矿开采达到顶峰。据严中平先生推断,滇铜开采最盛时年产达1200万~1300万斤^[4],《清史稿》对云南铜业生产经营情况的记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焉。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5]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矿丁六七万”左右的大规模铜矿如汤丹、碌碌(落雪)、大水沟皆为滇东北的铜矿。

铜矿业的大规模开发为云南,特别是滇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 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清代铜运是一个浩大而又繁琐的工程,滇铜京运涉及大半个中国。云南铜矿主要分布于滇东北、滇西和滇中三个区域,零散的铜厂分布,最终构筑了复杂的铜运体系。据《滇南矿厂舆程图略》“运第七”篇:“京铜年额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由子厂及正厂至店,厂员运之,由各店至泸店之员递运之,由店至通州运员分运之;局铜则厂员各运至局;采铜远厂则厂员先运至省,近厂则厂员自往厂运。”由于铜运,这一地区的古驿道和商道得以修筑、受到保护,并不断开辟,促进了该地区交通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铜运而开通了多条入川线路,“乾隆七年,盐井渡河道开通。将东川一半京铜由水运交泸”,“乾隆十年,镇雄州罗星渡河道开通。将寻甸由威宁发运永宁铜斤,改由罗星渡水运泸店”,“(乾隆)十五年,永善县黄草坪河道开通。将东川由鲁甸发运宁一半铜斤改由黄草坪水运交泸”,这些入川线路成为以后滇、川人员往来、

货物运输的要道。另外，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任东川知府的义宁，在任期间不断勘测铜运线路，“查有连升塘、以扯一带捷近小路一条，直至昭通，将长岭子、硝厂河等站裁撤，安建于朵格一路运送，移建站房、塘房，及法纳江大木桥一座，俱系义府捐资修建”^[6]，最终修建了从东店经昭店直至四川的铜运干道。

（二）促进了清代全国铸币业的发展

清朝时期，铜钱使用的广泛度应为历朝之最，促进了铸币业的发展。从康熙至嘉庆，清朝的铸币数量从有代表性的“京局”——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来看，是不断增长的。康熙六十年（1721），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各铸 36 卯，铸钱 67 万余串^[7]，而至嘉庆时期，据徐鼐所著的《度支辑略》钱法条记载，户部宝泉局，每年鼓铸 72 卯，铸钱 899856 串；工部宝源局，每年鼓铸 70 卯，铸钱 437448 串，如遇闰各加铸 4 卯^[8]。自雍正七年始，朝廷在云南广泛开采铜矿以后，宝泉、宝源二局铸钱铜料主要来源于滇东北汤丹、碌碌等铜矿开采的“京铜”。云南铜原料还供应多个省份铸币，如江苏宝苏局、江西宝昌局、湖南宝南局、湖北宝武局、广东宝广局、广西宝桂局、陕西宝陕局、浙江宝浙局、福建宝福局、贵州宝黔局、贵州大定局等。滇铜广泛供应“京局”和各省局铸币，促进了清朝前期铸币业的发展。另外，铜矿开采还促进了云南本省铸币业的发展。滇铜京运和外运各省，由于路途遥远，运铜艰难，成本较高。据《续文献通考》钱币条记载，明嘉靖年间，因大量鼓铸银钱，朝廷决定在云南就近买料铸钱，以节省成本。明万历、天启年间，朝廷曾两次在滇开设钱局鼓铸铜钱。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书朝廷建议在蒙自、大理、禄丰、祥云开局铸钱。雍正元年（1723），宝云局于云南、大理、临安、沾益、建水设炉四十七座鼓铸铜钱。据《铜政便览》载，自雍正至嘉庆年间，云南省先后设云南省局、东川旧局、东川新局、顺宁局、永昌局、曲靖局、临安县局、沾益局、大理局、楚雄局、广南局等十一局铸钱。各铸局虽然“复行停止，中间兴废不一”，但是比较诸局铸钱规模、数量、开设时间，地处滇东北地区的东川旧局、东川新局影响较大。

（三）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入

由于云南铜资源储量丰富，清初朝廷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铜矿开采的政策，最终迎来了“广示招徕”的局面，内地相邻诸省的富商大贾，都远道招募铜丁，前来采矿。据《东川府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南巡抚郭一裕奏“东川一带……各厂共计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佣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且查各厂往来，皆四川、贵州、湖广、江西之人”^[9]。乾隆四十一年（1776），云南约有移民人口95万^[10]，而矿业开发中“矿工中绝大多数是移民”^[11]。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也改变了滇东北地方的人口结构，据民国《昭通县志》载：“当乾嘉盛时，鲁甸之乐马厂大旺，而江南湖广粤秦等省人蚁附靡聚，或从事开采，或就地贸易，久之遂入昭通籍。”^[12]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地文化涌入云南。从滇东北现存众多会馆来看，会泽、昭通、巧家等地的古城都保留着众多内地移民修建的会馆。会馆是内地同乡移民建立联系的场所，是展现各地文化特色的窗口。当时涌入东川府开采铜矿的外省移民，形成一定规模和实力，并在东川地区修建的会馆有：江西人所建会馆“万寿宫”，湖南、湖北人所建会馆“寿佛寺”，福建人所建会馆“妈祖庙”，四川人所建会馆“川主宫”，贵州人所建会馆“忠烈祠”，陕西人所建会馆“关圣宫”，江苏、浙江、安徽人所建江南会馆“白衣观音阁”等。涌入昭通从事矿业开发和进行商贸活动的内地移民也建立了众多会馆，如：四川人建立的“川祖庙”，陕西人建立的“陕西庙”，江西人建立的“雷神庙”，福建人建立的“妈祖庙”以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贵州会馆等。从各会馆供奉的神像、建筑风格、雕塑、绘画等来看，无论是福建人供奉的妈祖，还是江西人供奉许真君、山西人供奉关圣大帝，以及火神庙供奉的火神娘娘、马王庙供奉孙悟空、鲁班庙供奉的鲁班等，都显示出中原文化的痕迹，同时又带有各地文化的特点。建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三圣宫”（楚黔会馆），位于铜厂运送京铜至府城途中的白雾村驿站，是东川府产铜高峰时期，财力雄厚时设计建成的。三圣宫大殿内正中塑关羽，两侧为关平、周仓像，左边供孔子牌位，右边塑之文昌帝君，而故名“三圣宫”。将关羽、孔子、文昌共融于一庙之中，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待宗教世俗的实用性及儒道合流的泛神现象。

清朝前期滇东北大规模的铜业开发，为该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内涵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我们把以古东川府（今会泽县）为中心，大致包括滇东北会泽、东川、巧家以及相邻四川的会理、会东、通安等地域，由于铜矿开采的繁盛，而形成的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称为“铜商文化”。“铜商文化”研究除前所述的铜业开发的历史、铜运、铸币、移民与文化传播之外，还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如：考古资料、地方官员的奏折、地方史志、文献通志、家谱、碑文等资料的整理与校注；铜业开发对滇东北环境影响的研究；移民与民族融合研究；铜政研究；铜的冶炼技术研究；铸币与金融发展研究；铜与东南亚、南亚经济贸易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内容，是很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为深入开展以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滇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曲靖师范学院成立了“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校注云南“铜政四书”成为研究院开展工作的第一步。

研究院成立以后，针对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的繁多芜杂，确定了首先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思路。2015年，我们决定对清代铜业铜政古籍中保存完好，内容完整的四本书进行校注，合为云南“铜政四书”。四部古籍中，《云南铜志》《铜政便览》《滇南矿厂图略》三部都是清代云南督抚及产铜地方、铜政官员等必备必阅的资料。《云南铜志》系由乾嘉时期辅助云南督抚管理云南铜政数十年的昆明贡人戴瑞徵根据《云南铜政全书》及省府档案编纂，资料内容记载时间截止于嘉庆时，凡铜厂、陆运、京运、各省采买、铸币等的各项管理制度及经费预算等都一一备载；《铜政便览》成书于道光时期，未题何人所纂，全书共八卷，内容框架与《云南铜志》基本一致，但补充了道光时期的资料，滇铜生产衰落期的面貌得以呈现；《滇南矿厂图略》为清代状元，曾任云南巡抚的著名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吴其濬编纂于道光年间，该书保存了丰富的清代矿冶技术资料，并有大量矿冶工具的清晰绘图。王昶的《云南铜政全书》残佚后，云南铜政的详情就以这三本资料所载最为详备了。《运铜纪程》是道光二十年京铜正运首起主运官大姚知县黎恂运铜至北京的全程往返日记，如实记载了滇铜万里京运的全部运作过程，与前三书合观，清代铜业铜政的全貌得以较为完整的呈现。

云南“铜政四书”的校注，出于为读者尽可能丰富地提供清代云南铜业铜政全貌资料的目的，主要采取资料补注的形式进行校注，在我们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尽量搜集相关资料补缀进去，期以丰富的材料启发研究的思路，所以我们的校注除非证据十足，一般不下结论性的语言。就每本书的校注而言，由于内容体例各有特点，如《云南铜志》《铜政便览》多数据，《滇南矿厂图略》多图，《运铜纪程》也可谓是游记，所以其校注要点各有侧重，校注方式不能划一，但求方式与内容的适宜。

这四本书的整理校注，得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青睐，双方开展了合作，并获得201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具体的校注工作主要由我院青年研究人员负责完成。在校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资料补注校注形式可能会导致校注显得繁杂，但这种校注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二是补校资料缺乏与清代宫廷第一手档案资料的比对，今后我院将加强对这部分档案资料中有关铜文化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三是缺乏第一手现场调查资料，铜厂、铜运路线的调查资料补充，会使这些文献的记录更为丰富、清晰，这也是我院今后工作的重点。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的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即将印刷出版，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将进一步推向纵深。在此，谨向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云南省图书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成长的校内外专家学者、支持我们工作的各位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的各位编辑，以及四位校注者和研究院的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祝我们的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杨黔云 于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2017年6月

注 释

[1] 鲁甸马厂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铜斧、铜剑等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文明的代表器物。

[2] 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3）。

[3] 白铜是一种铜合金，呈银白色而不含银，其成分一般是铜 60%、镍 20%、锌 20%。

[4] 严中平编著：《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7-42。

[5]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8：3666。

[6] （清）方桂修、（清）胡蔚纂、梁晓强校注：《乾隆东川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266-267。

[7] 《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7：4980。

[8] 戴建兵：《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钱币研究》，《江苏钱币》，2009（4）。

[9] 乾隆《东川府志》卷十三《鼓铸》卷首序、卷七《祠祀》，光绪三十四年重印本。

[10] 秦树才、田志勇：《绿营兵与清代移民研究》，《清史研究》，2004（3）。

[11] 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4：86。

[12] 民国《昭通县志》卷十《种人志》。

前言

一、《云南铜志》的作者

《云南铜志》的作者为清代人戴瑞徵，生卒不详。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中记：“《云南铜志》八卷，戴瑞徵编。瑞徵，字云章，号华峰，呈贡人。嘉庆间，由议叙官高要县横查司巡检。”这是关于戴瑞徵生平的唯一文字记录。对于道光《云南通志》的纂修者来说，戴瑞徵属于当代人，由于其地位不高，因此惜墨如金，只记录了其任巡检一职。

戴瑞徵当时的身份实际上是封疆大吏私人聘请的一个没有出身、尚未出仕的幕僚，也就是他自己说的“予为藩幕”。由于做事认真负责、成效显著、成绩出色，经过议叙、考绩优异，被提升为广东省高要县横查巡检司巡检。高要县横查巡检司为明代设立，清代沿袭不改。《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记：“景泰五年冬十月庚寅……设广东肇庆县高要县横查巡检司。”《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志三·外官》记：“巡检司巡检，从九品。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在清代，巡检为最低级别的官员，比科举正途出身的举人地位还低，但好歹入了流，进入了仕途、做了官，可以领俸禄，而不是做书役靠工食银两生活了。

《云南铜志》采用资料截止于嘉庆十五年（1810），《铜政便览》增补的资料亦起始于嘉庆十五年，截止于道光七年（1827）。因此《云南铜志》纂成之时应该即为嘉庆十五年，之后戴瑞徵到广东赴任，离开了云南，书稿留在云南藩库，成为云南官员行政的参考资料之一。

于时负责考核戴瑞徵的云南地方当局要员分别为云贵总督伯麟（嘉庆九年至二十五年任）、云南巡抚孙玉庭（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任）、云南布政使蒋攸钰（嘉庆十一年至十四年任）、云南按察使梁敦怀（嘉庆十三年任，

嘉庆十四年改任云南布政使，嘉庆十八年调京）。

二、《云南铜志》的编纂

方国瑜《〈云南铜志〉概说》（载中华书局1983年版《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729-730页）记述：

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云南铜志》八卷，戴瑞徵编，瑞徵字云章，号华峰，呈贡人。因经办铜政，作《云南铜志》，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有题记曰“光绪纪元，偶于戴府见此书，嘉其赅备，肆无刻本，因假归，命学徒抄存一册，原稿仍归戴氏，香圃记。”有“晚香室印”一方，知为黄华抄本，后归图书馆者。

是书凡《厂地》二卷，《京运》一卷，《陆运》一卷，《局铸》二卷，《采买》一卷，《志余》一卷。书前蒙化张登瀛序谓“呈贡戴子华峰，少负远志，储经济才而深沉不露，大吏推重之。历任方伯，聘勦铜政几三十年。以亲历周知，信今传后者，勒为一书，凡八卷，名《云南铜志》，其心苦而力勤，其事该而绪密，于制既详而有体，于法亦则而可循。在官为考绩之书，在幕为佐治之典，洵经华之提要也。华峰可以传矣。问序于瀛。”云云，则瑞徵为戴古村（淳）之父。

书中所记止于嘉庆年事，即为嘉庆间所作而未刊者。《晓翠轩诗续钞》卷五，戴“得刘寄庵师书及诗，奉答，并求采先人《铜志》入《通志》中”四首，有“先人所遗编，华列五金利，尚冀赐采择，庶用付书记；十年篋笥中，几经孤儿泪。”之句。即在道光六年，古村居民时所作也。

附说：

《铜政便览》。光绪十三年夏，路南知州陈先溶得《铜政便览》钞本，布政使曾纪凤排印之以广流传。按《铜政便览》不署撰人姓名，取与戴瑞徵书相较，大都相同，而有增补纪事至道光四年。盖瑞徵之书有抄本存藩库、后经修改，不著姓名，光绪间排印此书时，亦未考究，故缺作者姓名也。

方国瑜识。

《云南铜志》撰成于嘉庆十五年（1810）之后，戴瑞徵被“历任方伯聘

勦铜政几三十年”，那么其受聘参与云南铜政管理，则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之后。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为云南铜政管理又一个转型的时期。乾隆四十年，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撰《论铜政利病状》，力陈铜政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乾隆四十三年，清政府核定各厂京运铜的额数。乾隆五十年，署东川知府萧文言改强行征雇百姓马匹应役运铜为由政府出钱购买马匹设立行户组织马帮进行运铜。乾隆五十二年，云南布政使王昶编纂《云南铜政全书》。嘉庆十一年，云贵总督伯麟奏改铜运启运例限由一月宽限为四十日，使运员有充裕时间精心组织运输船队。嘉庆十二年，云南布政使蒋攸铨改革运铜管理方式，运员由有亏空、年迈之人，改为“以并无亏空、年力正强为合格。”运费由运员亏空部分扣存藩库充抵，改为全额发给，使运员毫无精神及经济负担，能够全身心认真投入运铜工作中。

《云南铜志》所记，乃改制以后之情况，于时云南铜政管理基本已经理顺，彻底改变了原来那种责任、负担全部在下层，上层严逼紧催，并绝无通融之余地的严酷无情、毫无道理的管理状况，铜的生产与运输，均走上了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如果后来不是因为鸦片战争影响了大清国运，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那么云南铜的生产、运输，仍然会恒序持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然而历史永远不可能有假设，历史只能是事实，历史就只是事实。

《云南铜志》写成以后，云南铜政管理措施基本完善，铜政管理政策再没有大的调整，开始因循守旧。因此《云南铜志》（后改编为《铜政便览》），便成为了云南行政当局以后进行铜政管理的一个范本。

三、《云南铜志》与《云南铜政全书》的联系

编纂《云南铜志》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乾隆年间，滇铜大盛，铜政为云南地方当局的重大政治项目。清代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记新任云贵总督阮元于“道光六年九月十三日，入云南界至平彝县接印。十八日申刻至云南省城，进署询饬各营务及各边务、铜政、盐政”。云南铜政居然排列在盐政之前，全国唯一。云南铜政因此为世人瞩目，而捉笔操刀撰文者，亦接踵而至。始作俑者，为乾隆二十年间在云南做知县的余庆长，撰

有《铜政考》八十卷，未刻失传。踵其事者，即王昶《云南铜政全书》。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六十、卷一千二百九十七记：“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以陕西按察使王昶为云南布政使。……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以江西布政使李承邨、云南布政使王昶对调。”云南布政使王昶仅仅在任一年余，即奉督抚之命撰《云南铜政全书》五十卷，分为八门。《清史稿》卷三百五《王昶传》记王昶于乾隆五十一年“迁云南布政使……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嘉庆十一年，卒。”无独有偶，戴瑞徵于嘉庆年间撰写的《云南铜志》亦为八卷。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为汇集官方资料而编成，亦未刊刻，并无抄本传世，后来失传。《云南铜政全书》原本作为官方资料存于云南藩署，道光年间编纂《云南通志》时大量采入。

王昶《新纂云南铜政全书·凡例》记：

一、恭录上谕。滇省铜政，仰荷皇上烛照无遗，随事训饬，圣谟洋洋，承办大小臣工，皆当时时恭阅，钦遵办理。且阅《钦定鼓铸则例》，历奉上谕，皆分类恭录。今纂《铜政书》，亦仿《则例》体裁，将历年钦奉上谕，分门恭录，仰遵圣训，随事敬绎，更为亲切著明也，

一、抽课收买。《周礼·太宰》以九赋斂财贿，山泽以及币余，各有常赋。历朝矿冶有税，前明路南州铜厂有课，盖六府金谷并称，固所以资平成也。滇产五金，而铜为尤盛。本朝康熙二十四年，总督蔡毓荣始疏陈矿硎宜开，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每十分抽税二分，委官监收，此为铜政之始。迨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复疏请官为经理，抽课收买，此为收买铜之始。见于案牒者如此，当时之奏疏部议，已散轶无存。今以抽课收买为第一门，从其朔也。雍正元年以前，经理之官《章程》屡易，各厂收买之价有上、中、下三等，又屡次议增，至无可增。因许通商，以资弥补，酌予水泄，以利攻采，是皆收买次第所有事也。铜价供支，不尽出自滇省，因纪其拨运协济。又如归公、养廉、耗、捐各铜，皆抽课之类，故汇而纪之。

一、厂地。《汉书·地理志》：俞元，怀山出铜。来维，从陆山出铜。《后汉·郡国志》：俞元，装山出铜。贲古，采山出铜、锡。滇之产铜旧矣。自蒙段窃据，画江为界，皆无可考。元产铜之所，曰中庆、金齿、临安、曲

靖、澂江，率止一二处数处而已。及我朝三迤郡县皆有之，凡四十余厂，宝藏之兴，盖非前朝所能伦比，而铜亦遂为滇之要政矣。各厂为出铜之区，而各厂为运铜之路，故次即列厂、店建设为一门，序各厂各店所隶之地，予厂之数，岁出之额，历年铜数之升降。设厂设店，则有官有役，因纪其经费，运铜程站脚费，厂、店之所交关也。因牵连而书之，亦惟经费之出于铜息者，则载于此。其他采买之程站，陆运之脚费，仍于各门纪之，以免紊乱。至管理则止纪其官，人无一定，皆不具载，其由何人经理得法，而铜获极丰，亦详其年分姓名纪之。各厂中有从前封闭后得矿复开者，故于封闭之厂考其地与封闭之年详记焉。

一、京铜。《文献通考》：禹铸历山之金。《禹贡》：扬州厥贡，惟金三品。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荊州厥贡，惟金三品，浮于江淮河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输金铸钱，以济民用，自昔已然。我皇上德协坤维，地不爱宝，滇铜之盛，亘古未有。因运京师以裕泉流，浮金沙江，逾江淮河，济达于河，远历万里，铜政莫大乎此。盖自雍正年间，滇铜运至湖北之汉口、江苏之镇江，应江、楚各省采买，已肇购运京铜之渐。嗣复在镇铸钱运京，乾隆三年，滇厂大旺，而八省采买，尽归滇省购运，于是定各厂各路陆运之法。既而开金沙江之黄草坪，又开罗星渡、盐井渡，三路水运。旋复以铸钱之铜加运于京，其间令民计程受值，舟车人力，并擅其功。自四川泸州以至京师委员，受铜、交铜，雇舟、易舟，守风、守水、守冻，引挽增夫，各省起程，沉溺打捞，追赔豁免，回滇报销，已备极委曲繁重矣，挨序纪之，为“购运京铜”门。自泸州至京，例案皆长运官所宜遵守者，向钞一册给运官，运毕缴还，今另为一册，以便书成可以刊发共知也。

一、钱法。九府圉法见于《周礼》，本于太公。汤铸于庄山，周景王铸于周昌，大抵古者多就铜山以铸钱。滇产铜多，而铸钱亦广。顺治十七年，云南开局铸钱，钱法实在铜政之先，自后分设于各府，或复或罢，或增或减，其议减议罢，损益因乎时，议增议复，酌剂因乎地，皆宜深加考究。故于案牍之中，检其奏议备录之，案牍中无可征者，则参诸省志以补之。分局题奏者，则以类相从，俾各有端委，不致分淆。其有奏议已见于他门者，设局增铸，则录其题定事宜于此门。裁减则于所裁局与炉之数节录之，以免重复，以便考证。至鼓铸余息，皆关经费，铜厂运供不前，因有参赔

筹息之案，虽若无关于钱法，备录之，亦可为后此厂员垂戒。

一、采买。自滇省铜盛，而外省钱法皆资挹注。初采买滇铜，止一二省，渐遂及于九省，始本暂时通融，久之遂沿为定例，成为岁额。内府外府，同关国帑，亦铜政之未可岐视者。各省铜数不同，铜价不同，前后增减又不同，其挽运有期，迟逾有罚，差员之侵亏者予以重谴，总汇为“采买”门。筹其兑发，俱其度支，道路之险易远近，具见于此。

一、厂欠。采矿煎铜，宜有接济，铜价不能无预支之数，久之成为逋负，因有厂欠之名。雍正二年，总督高其倬奏章中已备言之，铜价之数，皆定自数十年之前，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百物之价，数倍于前，而经费有定，采铜之价，不可议增，固准预支，俾其藉官项以资营运，而贫不能偿，暨逃亡者，逋负又倍多于前。究之帑藏所关，不可不慎。经前总督奏禁厂欠，仰荷我皇上仁覆无外，时颁恩旨蠲免，屡次皆数十万金，穷檐感激奋兴，而获铜得以无绌，今并纪为“厂欠”门。

一、考成。《周官·太宰》：以八柄驳众臣，曰日终考日成，月中考月要，岁终考岁会，第其上下，以为黜陟。滇省铜厂，一年考成，分功过而示劝惩，即岁终考岁会之法也。年终考成之外，有获铜加多，专奏升用者；有短铜悞运，特劾逮治者。统为“考成奏销”一门。其京铜、陆运奏销，另附于“京铜”“陆运”。

一、志余。凡条禀议详现在通行，虽未经奏咨，而亦为省例，均行辑入。其虽未通行，而于铜政有所考证者，亦披拣辑入，以裨采择。至铜政所重者，获铜、运铜，其踴引取矿，炼矿煎铜，虽若无关于铜政，而委折多端，厂民、炉户之艰难辛苦，必深知而后能悯恤之，亦不可阙而不讲，为“志余”。凡所辑录，皆纪姓名，不没其长也。

一书分八门，而各门中又各有类，门为大纲，类为条目，一切案例，皆以类篇。其奏疏部议，分门纂录，各从其类。要在有条不紊，非敢意为割裂。又或有前后援引，重出异见，则芟其繁复，取便观览。然但加节删，不敢改易其文，庶无失当日立言之旨。

一、采录书籍，恭阅《钦定鼓铸则例》书，办运京铜及云南省鼓铸两门内，办铜、运铜之序，固已大纲毕举，始终该备，今将各条于现纂书内，分门录入例文，以资援引，未敢妄加增减。又如《大清会典》《云南省志》，

或有关于滇省铜政者，又《吏部处分则例》，亦闲有为铜政所引用者，皆仿《鼓铸则例》之法，一并纂入。所录书籍，必标书名，以便稽考。

一、纂录例案之中，或于此类其议尚悬而未结，待证于他门，或大义已明，而覆咨覆奏无需纂入，则略撰数语，以便繙阅核对，一览而知。如是之类，俱用“谨按”二字以志之。

从王昶《云南铜政全书·凡例》所记与《云南铜志·目录》对照，可以知道，《云南铜志》体例为模仿《云南铜政全书》。《云南铜志》共八卷，由于《厂地》《铜运》《局铸》均分为两卷，实际各卷目名称只有“厂地”“铜运”“局铸”“采买”“志余”五项，“京铜”即铜运，“钱法”即局铸，其余三项名称一模一样。由此可见，《云南铜志》八卷连题目名称都完全来自《云南铜政全书》的八门分类。标题如此，内容自然也是以沿袭前者为主，增加后来变化的部分，并将《云南铜政全书》“抽课收买”“厂欠”“考成”三门内容分门别类纳入相关各卷中。

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叙述滇事之书”记：“《云南铜政全书》五十卷，清王昶修。是编乃乾隆五十二年，昶官云南布政使时，总督富纲、巡抚谭尚忠命之纂辑。分为八门，每门中又各有其类，门为大纲，类为条目，一切案例，皆以类编纂。凡奏疏、部议，分门纂录，各从其类。有前后援引，重出叠见，到芟其繁复，取便观览，但为节芟，不改易其文。自卷一至卷七为第一门：收买抽课；卷八至卷十一为第二门：厂地；卷十二至卷二十六为第三门：京铜；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为第四门：钱法；卷三十一至卷四十四为第五门：采卖；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六为第六门：厂欠；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为第七门：考成；卷四十九至卷五十为第八门：志余。终焉。钞存藩署，未梓。”

《云南铜政全书》第三门“京铜”计有十五卷，第五门“采买”亦为十四卷，两门共有二十九卷，几占《云南铜政全书》卷目的六成。其余六门共有二十一卷，平均每门三卷半。乃是以产品的供应对象即滇铜的最终用途为重点。《云南铜志》（共八卷）引为重点的“厂地”“局铸”两门（各有两卷），在《云南铜政全书》中都只各有四卷。两书编纂的目的不一样，内容重点也就完全不一致。

《云南铜政全书》分为八门五十卷，分卷过多，必然庞杂，因此许多卷